

# 調查研究報告

## (自選部分章節)

# 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平埔、泰雅與客家族群互動記憶

## 一、前言

桃園市、新竹縣的龍潭、關西地區，因為多為淺山丘陵，地理位置又是傳統意義下的「內山」地區。在清初時期，仍為凱達格蘭霄裡社、道卡斯竹塹社與泰雅族的傳統活動領域。至今的多數居住者雖為客家族群，但地方上的耆老仍流傳著「番仔相殺」<sup>1</sup>的口述與記憶，泰雅、凱達格蘭與道卡斯族的耆老之間也有不同於客家族群的表述。這不僅凸顯了區域間複雜的族群互動關係，以及歷史記憶在族群經驗上的差異。也讓我們理解，在一般認知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之外，存在關係更為複雜的凱達格蘭、道卡斯與泰雅族之間的平埔、高山原住民族群的互動記憶。然而，當筆者檢視目前的田野資料與研究文獻，關於此區域的研究多以清代檔案、地契為探討材料，有關本區域的開發史，以及霄裡社、竹塹社地權外流問題與隘墾制，以及竹塹社後裔之族群認同課題、「熟番客家化」與「平埔客」的研究，已有相關的討論。<sup>2</sup>

平埔族群在清代的開墾過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和「生番」衝突的前線，如霄裡社的蕭東盛、蕭鳴皋家族，自備資本在龍潭銅鑼圈、十股寮一帶，設隘開墾；竹塹社的衛阿貴家族，沿著鳳山溪開闢新埔、關西，建立街庄；砵子墾戶錢朝拔開墾橫山田寮坑一帶地方；以及擔任三灣屯弁的中港社土目胡新發，

---

<sup>1</sup> 本文「番」之用字與「生番」之用詞，為昔日史料與文獻慣用之文字，受訪者所述之「番仔」亦為該區域的高齡受訪者之慣用語，筆者在此並無歧視之意。

<sup>2</sup> 關於霄裡社、竹塹社地權外流問題與隘墾制，相關文獻可參考：張素玢，〈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99-125。而竹塹社後裔之族群認同的研究，相關文獻可參考：廖志軒，〈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邱美玲，〈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

在苗栗三灣、南庄、獅潭的「開山撫番」，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有些則經由理番衙門的考選而拔補擔任屯弁，如蕭鳴皋、蕭聯芳、錢茂祖、錢登雲、胡新發等，都先後擔任過竹塹大屯的千總或把總。

今日除了龍潭銅鑼圈有部分凱達格蘭霄裡社的蕭家族裔、關西境內有部分道卡斯竹塹社衛家族裔等平埔族群後裔之外，本區域各村落的人口以客家族群為多數。而在泰雅族傳統活動領域方面，地方志記載為新竹關西鎮的馬武督社與桃園復興區淺山一帶的竹頭角社、南雅社較為可能。霄裡社、竹塹社是龍潭、關西地區開發地方的重要角色，但是，龍潭、關西地區的泰雅族與平埔族之間複雜的族群互動記憶，以及客家人對於平埔族與泰雅族之間的互動記憶，在今日如何被形塑，卻鮮少有專門的探討。<sup>3</sup>

大漢溪流域在桃園一帶，由於是台灣罕見的南北向大河，學者柯志明曾考證〈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中乾隆 25 年（1760）的紫線新界，大致以大漢溪河谷為界，將溪東至山腳的漢人私墾土地棄為荒埔，任由熟番打牲與耕作。<sup>4</sup> 學者溫振華亦指出，桃園的霄裡社與龜崙社的共有契字中，提及兩社在大溪有祖遺之地，多少說明他們的部落領域，曾在部落更東邊的地區，不過，進一層的了解，必須對大溪至尖石一帶的族群關係有較多的研究。<sup>5</sup> 而在大崙崙溪沿岸的大溪、三峽一帶相關古契字中，也出現有「霄崙灣接四社」的公記（霄裡社、龜崙社、武勝灣社、擺接社），四社可能是在面對大豹群泰雅族的威脅時，以地緣的背景

---

<sup>3</sup> 筆者曾針對桃園龍潭、新竹關西地區原漢族群互動下的「番害」記憶進行探討，可參看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 2 卷，（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20），頁 125-138。〈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台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4 期，（臺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57-184。但是在田野研究過程中，筆者也發覺地方耆老的口述與歷史記憶，遠比一般認為的原住民／漢人這種二元對立框架更為複雜而多變。本研究即是從這個角度，納入凱達格蘭、道卡斯族、泰雅族、客家族群，從當代的歷史記憶與認知形塑方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sup>4</sup>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191。

<sup>5</sup> 溫振華，〈龜崙社研究〉，《臺灣風物》60 卷 04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10），頁 74-75。

所形成的聯盟關係。<sup>6</sup> 表面上看起來是番屯制中，沿著大崙崁溪的四個平埔社群的租佃、屯戍或經濟層面的合作機制，但是可能是四社聯合防阻泰雅族的區域聯防機制。另一方面，對於清代活動於大溪、龍潭、關西一帶的凱達格蘭族、道卡斯族與泰雅族南雅社（桃園市大溪頭寮至復興三民一帶）、竹頭角社（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阿姆坪至石門一帶）、馬武督社（新竹縣關西鎮一帶）等部落之間的社域演變。在歷史文獻、地方志與耆老口述當中，也有值得相互補充與進一步探究的材料。

因此，本文將從清代龍潭、關西地區的拓墾史、地方志與研究文獻，理解泰雅族、平埔族與客家族群的關係，再藉由筆者於 2017 到 2020 年在桃園、新竹沿山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所採錄到各族群後裔耆老的口述與記憶，佐以相關檔案文獻進行對照。探研究生番、熟番的互動記憶在當代泰雅、平埔與客家族群之間是如何被形塑與表述，背後隱含何種對於歷史的判斷。透過耆老口述與族群互動記憶的考察，也許是理解當下族群之間如何彼此認知的管道，並有機會對現有的歷史檔案與文獻進行補充與佐證。

## 二、清代的生、熟番關係之回顧

柯志明指出，清廷自乾隆 10 年（1745）起順勢利用熟番因海岸平原土地大量流失而往山區丘陵地帶遷移的趨勢，修改原「界內漢人熟番／界外生番」簡單二分式的族群空間分布，試圖形構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以熟番族群居間形成夾心層地帶，藉以區隔內山生番與海岸平原的漢人。該體制透過劃界遷民加強族群隔離，並操弄族群歧異以阻遏漢人進入界外開墾、聚民為亂。經過一段嘗試錯誤的過程後，三層制終於在乾隆中葉（乾隆 25 年左右）以一連串更加

---

<sup>6</sup> 溫振華，〈龜崙社研究〉，頁 71。

嚴密、周詳的軟硬體措施——土牛界、番通事、隘番制、熟番地權保護、理番同知衙門設立——加以落實。<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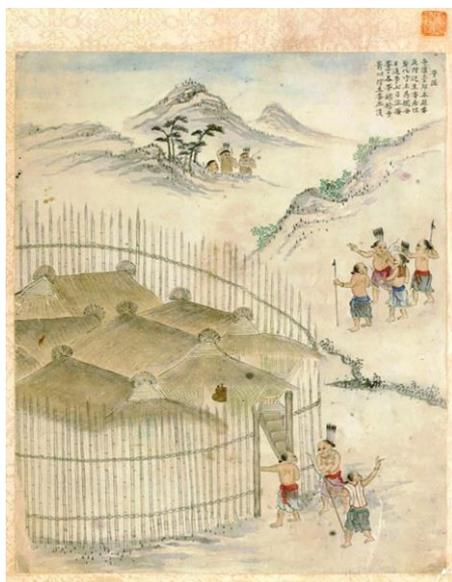


圖 1：〈守隘〉，《番社采風圖》，清乾隆年間（西元 1744-1747 年），40.5X 29.5，繪本，典藏號 8536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圖 2：〈瞭望〉，《番社采風圖》，清乾隆年間（西元 1744-1747 年），40.5X 29.5，繪本，典藏號 8536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在熟番守隘的勞役方面，學者杜正勝曾為《番社采風圖》的〈守隘〉（圖 1）圖解，所謂平埔族基本上都是「熟番」，他們與尚未漢化的原住民也存在著敵對緊張的關係。本圖描述接近「生番」的平埔族村社，編竹為柵，環繞聚落周圍，以資防衛，並派壯丁攜帶弓箭、長矛巡邏，隨時準備迎「生番」的襲擊圖中遠遠三人的頭陀髮型和鹿皮衣表示們是未漢化的「生番」。<sup>8</sup>而〈瞭望〉（圖 2）所繪

<sup>7</sup> 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第 22 卷第 02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5），頁 45。另一方面，乾隆 51 年（1786 年）發生的林爽文事件，證實三層制的落實不只徒勞無功且適得其反，而原先被忽視甚至曾遭摒棄的部分（積極利用熟番武力），卻繼續發揚光大，甚至發展成為林爽文動亂後臺灣邊境族群政策（屯番制）的主要內容。參見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第 22 卷第 02 期，頁 95。

<sup>8</sup> 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68。

的是凱達格蘭族「之巴里社」的建築，左上角為望樓。是平埔族在聚落外用竹木編架涼亭式的高聳望樓，派遣未婚青年日夜看守：「淡防竹塹、南崁....等社通事、土目，建搭望樓每日派撥麻答巡視，以杜生番，並防禾稻」。<sup>9</sup> 以此遠眺偵察，以防未漢化之原住民盜取稻穀。



圖 3：〈生熟兩蕃彼此不親近〉（生熟兩蕃互に相親まざるの圖），收錄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風俗畫報臨時增刊第 129 號臺灣蕃俗圖會》。東京市：東陽堂，1896。筆者翻攝。

關於望樓的設置，在乾隆 11 年（1746）布政使司高山〈條奏臺地民番事宜〉。該奏指出為防止生番出界戕殺，應令逼近番地的莊民於秋冬之時移入附近大莊居住，要求「貼近生番莊社，各設望樓一，懸掛銅鑼，每樓分撥五人，晝夜巡邏。近社者派番，近莊者派民，十日一輪，各自保護，鄰莊有警，互相救援」。<sup>10</sup>並

<sup>9</sup>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灣文獻叢刊第 9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55。

<sup>10</sup> 張本政，《清實錄資料選輯》，（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149。

於「生番出沒處所，設立隘口，添建望樓，氣勢聯絡，莊民與熟番共相守禦」。<sup>11</sup>在此，我們既不能將「番隘制」簡單地理解為，讓熟番在番界隘口處的巡守制度，因為其本質是一套處理乾隆中葉熟番社、漢業戶與界外私墾土地控制的辦法。<sup>12</sup>但是，也無法忽視熟番在番界隘口處與生番形成接觸與衝突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1790 年之後清朝重新劃定「番界」，施行「番屯制」，讓平埔原住民在屯墾同時擔駐守邊界，防範高山原住民族，當時許多沿海、平原的平埔原住民族，被遷移到西部淺山邊緣及山區駐守，希望達到「以番制番」的效果。清廷除強化番社管理體制，賦予熟番身分上特有「表徵」外，也配合番界政策的轉變，開始動員這些番人協力守邊、維護治安，甚至在爾後也利用番屯制度將熟番部落帶向軍事化，形成在官方軍事編制的「屯番」。<sup>13</sup>也讓我們無法忽視這之間形成的族群互動記憶。

從乾隆 15 年（1750）紅線舊界之外的熟番，到乾隆 25 年（1760）紫線新界之外的熟番，接著到乾隆 49 年（1784）番業漢佃、乾隆 55 年（1790）的屯番保留區。漢人、熟番與生番之間的衝突越來越頻繁。例如在〈生熟兩蕃彼此不親近〉（生熟兩蕃互に相親まざるの圖）（圖 3）中就描繪生番在暗地裡監視熟番在拓墾時的行為，以及有無侵犯獵場、彼此已經無法兼容的景況。因此熟番也存在吃「生番肉」之事，光緒 4 年（1878）的 10 月上旬，加拿大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一行人由內社徒步北上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牧師見面的途中，在南投埔里的 Chiu-sia-hun（守城份）見到平埔族殺害生番後，某位平埔族婦女將其烹煮並分食的場景：

---

<sup>11</sup> 陳雲林，《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64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頁 199-202。

<sup>12</sup> 鄭瑩憶，〈王朝體制與熟番身分：清代臺灣的番人分類與地方社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7），頁 71。

<sup>13</sup> 鄭瑩憶，〈王朝體制與熟番身分：清代臺灣的番人分類與地方社會〉，頁 67。

一天下午，經過 Chiu-sia-hun 時，我看到一群小孩高興地歡笑、大叫，正快樂地嬉鬧著。奇怪的是，他們手上都拿著滿滿的牛肉和骨頭，啃得津津有味。我問了幾個人，然後去到一個鄰近的小屋，裡面很雜亂，有個女人忙著做菜。大鍋子裡面裝滿湯和大塊的肉，兩張桌子上擺滿了肉和骨頭。我發現這些東西是從兩個人身上取下的肉，村民快把這兩個人吃光了，我內心的震驚無法言喻。我對於那位女士表達我的厭惡，他卻只是笑了笑，但是我堅持要表達我的憎惡之意，終於她生氣了，回答道：「為什麼我們不該吃他們？他們砍了我丈夫的頭，砍了我姪子的頭，他們自己罪有應得」。<sup>14</sup>

與甘為霖牧師一同進入致霧社領地的史蒂瑞 (Joseph Steere, 1842-1940)，也提到許多熟番每年貢獻稻米及水牛給生番，但仍有 14 至 20 名熟番遭到獵殺。<sup>15</sup> 食番肉這種迷信，在當平埔熟番殺戮生番時，尤為盛行，<sup>16</sup>甚至熟番可能也漸漸與生番做出區別。伊能嘉矩在田野報告中寫著，1890 年代的平埔蕃知道他們的居住地附近有生蕃，而且很害怕他們，平埔蕃不相信自己與生蕃同族。平埔蕃有口碑，流傳以前屢次與生蕃交戰。<sup>17</sup>

總體而言，清代在生番與熟番之間互動的紀錄極為有限，但仍可從既有的歷史文獻與圖像中，看到清代族群政策下的熟番與生番之間，在「防番」與「捍衛獵場」過程中的攻防關係，以及熟番在和漢人進行拓墾的過程中，與生番產生的摩擦與衝突。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爬梳清代桃園、新竹內山地區的竹塹社衛家、

---

<sup>14</sup>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著，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沙素描——甘為霖牧師臺灣日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 年)，頁 99。

<sup>15</sup> 史蒂瑞(Joseph Steere)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19 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民》，(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 年)，頁 90-91。

<sup>16</sup>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卷，(東京：刀江書院，1965)，頁 909。

<sup>17</sup>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旅行》，(臺北：遠流，2012)，頁 77。

霄裡社蕭家的開發歷史與侵犯「生番」活動領域、以及和「生番」衝突的關係。

### 三、清代桃園、新竹內山地區的生、熟番互動

在桃竹地區的開發史研究中，已有涉略過客家與熟番之關係，或是漢人與生番關係之歷史考察，<sup>18</sup>但卻鮮少文獻探討熟番與生番之間的關係，以及當代平埔族與泰雅族後裔對於各自的歷史表述。從清代的番屯制度來看，本文涉略到的霄裡社與竹塹社，有幾個共通點：一是同屬北路大屯下的竹塹大屯。二是兩社在乾隆 55 年（1790）所分配到的養贍埔地皆在武陵埔（今桃園市龍潭區），且兩社社地相鄰（位在今新竹縣關西鎮與桃園市龍潭區交界的牛欄河，即為兩社領域的交界處），屬於地緣社群。<sup>19</sup>在這一節中，筆者會進行竹塹社、霄裡社熟番與泰雅族之間關係的梳理。

#### (1) 竹塹社衛家與生番的關係

在竹塹社方面，十八世紀初期漢人大量入墾以前，竹塹地區南至鹽水港溪、北至楊梅頭重溪的平原地帶（漢墾區），原為道卡斯族竹塹社與眩眩社的主要生活空間；其東邊靠近「內山」一帶（保留區與隘墾區），原為此平埔社群的獵場，同時為高山族賽夏族與泰雅族出沒的地域。<sup>20</sup>乾隆 55 年（1790）清廷給予竹塹社竹塹社屯番 59 名，分給武陵埔的埔地 154 甲的養贍埔地（位於桃園龍潭區的武漢里一帶），此地已經靠近泰雅族馬武督社與竹頭角社的領域。

---

<sup>18</sup> 參見詹素娟〈新苗地區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歷史之研究(1895-1950)〉(2008)與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2004)。

<sup>19</sup> 廖志軒，〈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頁 30。

<sup>20</sup> 林文凱，〈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140。

竹塹社的衛阿貴於乾隆 56 年(1791)，向官府申請，獲得開墾權而成為墾戶，他從新埔崛起招佃開墾老煥寮及大旱坑等地，乾隆 57 年開拓坪林、下南片及下橫坑之部分地方。當開墾至石岡仔時，因其東方之地地形低窪，附近又有「生番」群聚山頂，由高地持鎗或弓與衛阿貴對抗，造成他無法繼續拓墾，轉而開墾新埔方面的大茅埔、三洽水等庄。乾隆 58 年(1793)，陳智仁奉憲示諭組墾號連際盛在咸菜礮設隘並建立墾區莊，此期竹塹社番也積極投入與漢人合作的拓墾活動，但由於地近「生番」，衛阿貴受僱為隘首協助設隘。不久連際盛放棄墾權，由衛阿貴接手續招客家漢佃開墾。

由衛阿貴繼任咸菜礮新興莊墾戶後，先後開墾上南片、拱仔溝、牛欄河及上三墩等地，道光年間，其孫衛壽宗接任墾戶，持續地向東向南拓墾，再深入內陸逼近「生番」居住地。<sup>21</sup>到了乾隆晚期可能已在本區北界的大茅埔、三洽水等處設隘防番。<sup>22</sup>至嘉慶年間已陸續拓墾鳳山溪上游大小支流河谷盆地，並建立大小隘寮十餘座。<sup>23</sup>在嘉慶 17 年墾成鹹菜甕時，衛阿貴等人已經拓墾到牛欄河一帶，可是當時馬武督群泰雅族仍然盤據下三墩、四寮山區（龍潭棋拔嶺、粗坑之南的關西北側），<sup>24</sup>又因泰雅族盤據東方丘陵山地，拓墾進展逐漸緩慢下來，<sup>25</sup>並以牛欄河為屏障，並於沿河設置隘寮形成隘防線以防禦泰雅族。<sup>26</sup>

泰雅族研究者徐榮春經過調查指出，馬武督社的傳統領域除了關西錦山里、金山里之外，甚至涵蓋暗潭以外的地方，還有更北邊的東山里大竹坑一帶，也就

---

<sup>21</sup>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13-15、38。

<sup>22</sup> 謝金蘭編著、新竹獻文獻委員會譯，《咸菜礮地方沿革史》，（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3），頁 3-4。

<sup>23</sup> 李明賢，《鹹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11-15。

<sup>24</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桃園：龍潭鄉公所，2014），頁 471。

<sup>25</sup> 李明賢，《鹹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頁 13。

<sup>26</sup>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68。

是彩和山以北偌大的山林。<sup>27</sup>直至道光 9 年（1829），衛壽宗將隘寮移置湖肚東側的白石山一帶，「生番」的勢力逐漸退到湖肚東面的山地。<sup>28</sup> 拓墾活動跨越牛欄河之後，進入馬武督溪流流域的老社寮，並持續地向內山進逼生番居住地。<sup>29</sup>同治 6 年（1876）羅阿傳受衛壽宗之墾批而開拓者，有八股、十股、柑仔 樹腳、湳湖各地。衛壽宗開拓湳湖以後：當開拓湳湖地方之際，屢遭逃竄內山之「生番」及向來之馬武督社人反抗，嗣後經全部擊退。<sup>30</sup>不斷壓縮到泰雅族的傳統活動領域。



圖 4：清道光 8 年間，霄裡社蕭家與竹塹社衛家墾地略圖。

底圖來源：Google 衛星地圖，文字為筆者所加。

<sup>27</sup>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類組碩士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0)，頁 38-39。

<sup>28</sup> 李明賢，〈鹹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頁 13。

<sup>29</sup>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15。

<sup>30</sup> 范明煥，〈時間裡的空間格局文化的代言人—新竹縣溪北五鄉鎮市舊地名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頁 55。

綜觀之，從嘉慶 5 年至道光 16 年間，衛阿貴、衛壽宗積極領導眾佃拓墾，在其用力把隘之下，拓墾情形相當順利，由此可見衛家勢力。<sup>31</sup>有衛阿貴、衛福星、衛壽宗、衛榮宗、衛國賢等擔任墾戶，持續逼近泰雅族等「生番」的活動領域。但是，到了同治 9 年（1870）之後衛家勢力開始衰退，光緒 15 年（1889）五月，清政府撤銷竹塹社的番大租四成，並將竹塹社併入新竹縣的管轄之內，這波租稅改革與社制調整的政策，也造成衛家收入的損失，終使其家勢逐漸衰退。<sup>32</sup>到光緒年間以後的墾戶均由漢人充當，也因為漢人佔絕大多數之原因，此地平埔族已逐漸為客家人所同化，<sup>33</sup>取而代之的是漢佃持續進墾深山。

## (2) 霄裡社蕭家與生番的關係

清代凱達格蘭族霄裡社的傳統社域包括番仔寮台地和龍潭台地，活動範圍從今日八德區霄裡、霄裡東南的大溪社角、番仔寮，西南自平鎮區的社子、楊梅水尾、龍潭九座寮、銅鑼圈，大致由桃園台地的南端至龍潭台地，呈現東北西南走向的狹長區域。<sup>34</sup>

依據《淡水廳志》〈建置志〉中記載，龍潭地區曾經設有霄裡大銅鑼圈隘、四方林隘、三坑仔隘、大坪隘等四個民隘。<sup>35</sup>桃園地區在乾隆年間的開發漸及霄裡社域，墾戶薛啟隆與霄裡社通事知母六為推展墾業與維護佃戶安全，遂加強山仔頂、三坑子兩個隘的隘務（今平鎮與龍潭範圍內），墾業始興。拓墾的腳步隨著隘務步伐前進，逐漸深入內山的龍潭地區。當時此地為平埔族的保留地，並毗

<sup>31</sup> 李明賢，《鹹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新竹縣立文化局，2005），頁 26。

<sup>32</sup> 陳志豪，《機會之莊：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139。

<sup>33</sup> 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101。

<sup>34</sup> 張素玢，〈南崁地區的平埔族群〉，收於《平埔社群的區域研究論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172。

<sup>35</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叢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54。

連著泰雅族的活動領域。霄裡社通事知母六招佃進墾龍潭地區，當時以番子寮、九座寮為開發起點，在三坑仔、四方林設隘護墾，採東西向、橫軸式往兩側向山區推進。<sup>36</sup>

桃園龍潭的黃泥塘在乾隆 13 年（1748）有蕭那英，乾隆 33 年（1768）有蕭鳳生、張昂拓墾。淮子埔、大坪在乾隆 33 年（1768）蕭鳳生、鍾京湖（客籍墾民）等人開始拓墾。馬陵埔在乾隆 35 年（1770）蕭鳳生、黃慶興，到了乾隆 45 年（1780）由蕭阿生、林淡持續進墾。武陵埔在乾隆 43 年（1778）有蕭鳳生、蕭際朝（客籍墾民），乾隆 45 年（1780）則有蕭鳳生、李華、王海等人進行拓墾。在嘉慶初年，霄裡社第三代的蕭東盛在銅鑼圈設隘（今龍潭高原里範圍內），並在道光 3 年（1823）開墾成庄。<sup>37</sup>

另一方面，龍潭的打鐵坑、粗坑一帶在嘉慶末年也有蕭阿生、黃大昌（客籍墾民）進入拓墾。道光 3 年（1823）霄裡社第三代的蕭寶盛與墾戶黃明漢、鍾京湖等人，率武裝佃民進到番界合力設置大坪隘（今龍潭大平里附近）。他們將拓墾的範圍往前推進到三角林（今龍潭三林里附近）、十一份地區（今龍潭高平里附近），並在道光 6 年（1826），蕭東盛集資招募十股漢佃，共同開發十股寮、三角林，到光緒年間陸續墾成大坪、二坪。<sup>38</sup>十股寮在光緒年間則有蕭瑞雲招漢佃，分為十股開墾。此時在龍潭各處的開墾都不乏有霄裡社的蕭家族人之身影。

其中，霄裡大銅鑼圈大隘本在四方林，後移入內山要處，距離竹塹城東邊五十三里，鹹菜甕之北，防禦包含橫岡下、深窩子、牛欄河、石崎仔、南窩、十股寮、崁頂、泥橋子、六損寮、大庄與雞籠坑一帶。清朝對於台灣西部山區採取隘

---

<sup>36</sup> 傅寶玉，《水利與地方社會：大嵙崁溪左岸的水圳·信仰與社群關係研究成果報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2008），頁 6。

<sup>37</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49。

<sup>38</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51。

防授田的方式，由於此區主要為泰雅族的分布區域清代此區為界外「生番」之地，由官方授予土地給隘首、隘丁，使其自耕自給，霄裡社的蕭東盛也由同樣的方式開拓銅鑼圈地區。不但要籌募資本，又需對抗「生番」，而所墾之地山多田少，在這裡開墾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而作為隘首的責任又重。隘首要督領隘丁防守，搭蓋隘寮，四處巡守。<sup>39</sup>道光 8 年（1828）的蕭家古文書紀載：

霄裡社業主蕭東盛，自備工本建設隘寮，顧丁把守地方，以便  
農耕，招佃墾耕以資隘糧，今有佃人前來承墾埔地一處……其  
坑東至山頂、天水流落為界，西至石崎仔，南至龍崗山頂天水  
流落為界。<sup>40</sup>

古文書中所述的「南至龍崗山頂」，推測即是現在粗坑山至柯仔寮山、十寮山一帶的山稜線。另外根據同治 4 年（1865）霄裡社的地契，立契人蕭乾興所立的契名〈立給山坑埔地墾契字〉坐落於畚箕窩（今關西東安里），<sup>41</sup>是現存地契中最靠近東南邊泰雅族馬武督社域的蕭家土地。光緒 7 年（1881）擔任福建巡撫的岑毓英來台巡視各路情形，提出「熟番」擔任北路開山撫番的前鋒，提議設置屯千總等職，負責管理統帥各路屯役。<sup>42</sup>施行「以番制番」政策。徵調番社的「熟番」至內山一帶設隘把守，防範「生番」的出草。蕭聯芳遂於光緒 8 年（1882）擔任北路屯千總，負責內山地區相關的防番事務。

而光緒 10 年（1884）則發生承墾霄裡社土地的佃人劉安邦，糾集匪徒搗毀

---

<sup>39</sup> 張素玢，〈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於《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112。

<sup>40</sup> 黃美英，〈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93。

<sup>41</sup> 劉澤民，〈臺灣總督府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下）〉，（南投：臺灣省文獻館，2004），頁 48。

<sup>42</sup> 岑毓英，〈到臺籌辦開山撫番等事片〉，收於《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 123-125。

蕭仲榮的三座隘營，導致兇番屢次攻擊佃人的事件。<sup>43</sup>當時新埔劉家的租稅爭議的文書中，蕭鳴皋也多次提及：「蕭家在此地設隘防番已經四代（蕭那英、蕭阿生、蕭東盛、蕭鳴皋）」<sup>44</sup>、「父蕭東盛自備資斧開墾銅鑼圈，建隘募丁防禦生番，護衛居民安居樂業，就地取糧以資隘需」。<sup>45</sup>雖然無法明確得知「搗毀蕭仲榮的三座隘營」的位置，但是從古文書上的記載，可以推測就是霄裡社土地南邊的山嶺，即包含泰雅人的活動領域。據地方志記載，漢人尚未進墾龍潭時，龍潭臺地和內山地區，是泰雅族大崙崁群及馬里闊灣群馬武督社的獵場，<sup>46</sup>學者張素玠也指出，銅鑼圈往南不遠，便是今天新竹縣北的馬武督社，為強悍的泰雅族活動地區，也是客家、生番、熟番交界處。<sup>47</sup>地方志也記述，馬武督社有三、四的部落散居於北側的赤柯山一帶（今關西玉山里、錦山里、金山里）馬武督溪上游河谷與龍潭的銅鑼圈僅有一溪之隔。<sup>48</sup>而在地方志中記載大銅鑼圈大隘其中一處，經耆老蕭柏舟口述，位於柯子崎一帶。<sup>49</sup>柯子崎即位於牛欄河上游左側利於防禦偵查的高崁。

接著是光緒 10 年（1884），擔任北路屯千總的蕭聯芳因案詳革，由竹塹社的錢登雲陞補北路屯千總。隨著開山撫番的持續進行，番屯制度到了光緒 12 年（1886）時，已逐漸走向衰微。但是巡撫劉銘傳「仍留原額四千，酌裁土勇，就其原餉，每年按屯抽調，分扼山內生番……以補綠營兵丁之不足」。<sup>50</sup>光緒 13 年（1887）仍將屯兵原額維持四千，每年按兵抽調分班出防內山生番，以六個月換防一班。光緒 20 年（1894）竹塹屯防廳給霄裡社頭目蕭瑞雲的調換事項中記述，

---

<sup>43</sup> 王世慶，《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影本》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1977-1984）年，無頁碼。

<sup>44</sup> 不著撰人，《淡新檔案》第 22104-9 號，國立台灣大學藏。

<sup>45</sup> 不著撰人，《淡新檔案》第 22104-11 號，國立台灣大學藏。

<sup>46</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133。

<sup>47</sup> 張素玠，〈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頁 122。

<sup>48</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134。

<sup>49</sup> 彭啟源，〈回溯先民拓墾史：台三線上的隘寮探尋〉，《桃園客家》第 5 期，（桃園：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2016），頁 16。

<sup>50</sup>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頁 305-307。

各個屯選調五成屯丁出防大嵙崁一帶山隘。<sup>51</sup>文獻中多次提及蕭家擔任要職、設隘防番，而「大嵙崁一帶山隘」所要防堵的可能就是活動於桃園復興、大溪地區淺山的大嵙崁群泰雅族。

已有相關文獻指出「此地鄰近泰雅族的南雅社、竹頭角社與馬武督社域。在南雅社與竹頭角社方面，同治 10 年（1871）《淡水廳志》提到大嵙崁群泰雅族人的聚落：「續查大姑嵌內山生番三十二社……曰竹頭角（得樵穀社；番酋十八名），曰南雅社」。<sup>52</sup> 據學者傅琪貽的考證，竹頭角社是現在復興區的長興、高遶一帶的部落；南雅社位於現在大溪區的頭寮到三民之間。<sup>53</sup>前者為此地的早期居民，居住於頭角、高遶、喜龍、新柑坪與石門，<sup>54</sup>在清治中葉，竹頭角社部分社民沿著大嵙崁溪西移，散居在大溪一帶，<sup>55</sup>這些地方皆在霄裡社與漢人共同進墾之後，成為設隘防守的墾區，而泰雅族人則退入深山。

光緒 12 年（1886）五月，臺灣巡撫劉銘傳發現以往的隘制有名無實，因此大力改革隘防事務，廢止原來「官隘」及「民隘」之區別，以內地的勇軍充當隘丁。因不慣水土，後又改用原設的隘丁或採用臺民強壯者，訓練成隘勇從事隘務，並編列成勇營，因此再度壓縮到泰雅族群的生活領域。<sup>56</sup>這一年，鹹菜甕庄墾戶連日昌等人聯名上奏給官府，奏請派遣官兵招撫馬武督一帶泰雅族人所附的地圖中，鹹菜甕庄北側仍然標註著「銅鑼圈蕭鳴皋分界」（圖 5）。

到了光緒 13 年（1887）二月間，「金廣成」奉諭招佃開闢崇壠山十寮庄一

<sup>51</sup> 王世慶，《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影本》第一輯，無頁碼。

<sup>52</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叢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84。

<sup>53</sup> 傅琪貽，《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嵙崁事件（1885-1910）》，（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頁 39。

<sup>54</sup> 瓦歷斯·若幹，《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75。

<sup>55</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134。

<sup>56</sup> 鄭安晞，〈桃園山區泰雅族空間與文化變遷(1880~1920)〉，《桃園文獻》第 3 期，（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頁 7。

帶。至此泰雅族原住民生活領域被壓縮至彩和山、石牛山的東南的區域。此一時期，龍潭銅鑼圈蕭家的勢力雖因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所影響，但霄裡社頭目蕭瑞雲仍是北路屯千總，並帶兵把手龍潭、大溪一帶的山隘。<sup>57</sup>光緒 14 年（1888）漢人又在彩和山開墾作料熬腦，<sup>58</sup>光緒 15 年，馬武督社群的勢力，已經被迫侷限在彩和山以南的地方。<sup>5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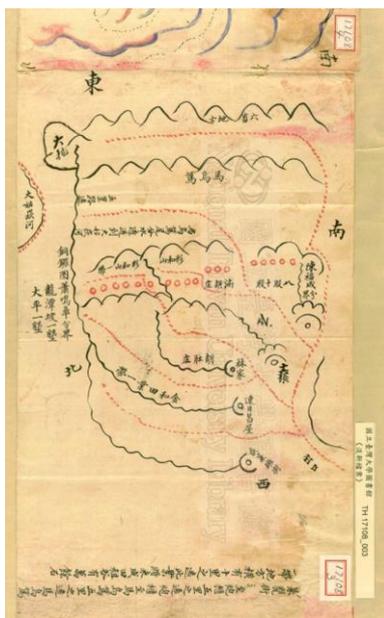


圖 5：淡新檔案 17108-3，鹹菜甕庄墾區圖。

綜上文獻，清嘉慶初年，桃園、新竹地區泰雅族於淺山諸社的傳統社域，大約西底新竹關西東光里十六張的牛欄河一帶，西北達牛欄河上游、銅鑼圈一帶，北抵龍潭大平里的石門、大坪山一帶，包括龍潭高平里的粗坑、瓦窰下、高種山、棋拔嶺，大平里的小竹坑，東安里的上三墩、畚箕窩，東山里的湖肚、十寮、大竹坑，東光里的湳湖、十股、高坪、暗潭等地。其中，竹塹社衛家曾擔任墾戶與隘首，或是霄裡社蕭家曾擔任的北路屯千總，都是位於與泰雅族頻繁衝突的拓墾

<sup>57</sup> 參見王世慶，《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影本》所收錄古文書：「光緒 13 年(1887)將屯兵原額維持四千，每年按兵抽調分班出防內山生番，以六個月換防一班」。

<sup>58</sup>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書，1999)，頁 30。

<sup>59</sup>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類組碩士論文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0)，頁 40。

前線，擔當帶領、分派隘丁，或是承租土地給漢佃的業主。學者施添福指出，由於當時平埔族社番不斷被派往內山擔任守隘的工作，無暇農耕。<sup>60</sup>因為平埔族人長期從事隘防工作，累積豐富的防番經驗。<sup>61</sup>隨著漢人與霄裡社、竹塹社人的進墾，活動領域呈現逐漸被壓縮的現象。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以田野調查的第一手材料，探究今日後裔耆老如何記憶與表述歷史中的族群關係，以及蘊含何種記憶型塑的過程。

#### 四、各族裔耆老的族群互動記憶<sup>62</sup>

竹塹社與霄裡社分別在清同治年間與光緒末年逐漸衰微，淡出地方開發史的舞台，而泰雅族與平埔族之間的接觸，也隨著平埔族人隱沒在漢人社會當中而漸漸消失。但是在民間社會當中，仍存在著各自族裔對於族群歷史的表述與記憶，藉由這些口述歷史，也許可以深化我們對於族群歷史記憶的型塑，以及族群之間如何理解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首先，筆者訪問到泰雅族人瓦歷斯·哈勇，談到昔日大溪地區的平埔族與泰雅族的互動：

以前我們還不知道漢人跟客家人的時候，(大漢溪)河東河西，我們這算是河東，看到河西就是平埔族在洗衣服，我們這邊就是泰雅族在洗衣服，互不攻擊，因為我們河很大，平埔族我們也都知道，平埔族我們都有稱呼。因為山上沒有鐵器，我們會到平地和平埔族交易，訂製我們的番刀，我們番刀的形制跟平埔族的不一樣，是山上要用的，所以都會特別去講要怎樣的刀型，老人家以前走到慈湖那邊都會住一晚，那邊

<sup>60</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頁 85。

<sup>61</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頁 87。

<sup>62</sup> 本文所訪談的內容著重在於平埔族的番屯、泰雅族的傳統領域變化以及客家人在拓墾中的社會位置與角色，以及部分泰雅族與平埔族的族群關係，還未論及沿山地帶，包括異族通婚（含收養等）、交易與經濟、社會網絡、征戰等互動關係。因為篇幅限制，留待之後續寫。

有一座我們的草寮，老人家都會停下來抽根菸草，然後再繼續往平地交換東西。<sup>63</sup>

瓦歷斯·哈勇是復興區上巴陵部落的泰雅族人，現年 57 歲。在他的記述中，一位祖先曾經住在三民一帶的泰雅耆老和他講述，在漢人還未進入大嵙崁地區時，泰雅族與平埔族以大漢溪為河界，會到平地和平埔族人訂製番刀、交易物資，並存在對於漢人、平埔族之間的辨認。在關西戈尤浪部落的彭姓耆老，也有對桃園龍潭地區平埔族的記述：

以前部落的土地很廣，包括桃園龍潭、石門水庫、關西六福村、坪林一帶、甚至到橫山鄉的沙坑。我們是從尖石水田部落分出來，原本要往新埔、龍潭一帶，那時有一個頭目從尖石水田部落遷過來這裡之後，原本要往關西六福村、龍潭銅鑼圈小人國那一帶建立新部落，因為那邊獵物很多，又是丘陵地……後來就跟那裡的人打得很慘烈，那也不是客家人喔，那是平埔族的，在銅鑼圈那裡打戰就打了好多次，他們到那邊開發，和我們打得很慘，戰爭就打了好幾次，反正就打得很慘烈，漢人越來越多之後就撤回來這裡。<sup>64</sup>

戈尤浪部落的彭姓泰雅耆老，現年 68 歲，他講述以前一位部落領袖曾經想在龍潭、關西、新埔一帶建立新部落，領域曾到龍潭銅鑼圈、六福村一帶，後來遇到和平埔族的慘烈衝突，並強調並非是客家人。關於龍潭銅鑼圈、六福村一帶是部落獵場的說法，與戈尤浪部落原來同屬於一個部落的關西馬武督部落，訪問到的高姓耆老也有類似的傳述：

---

<sup>63</sup> 梁廷毓，〈瓦歷斯·哈勇訪談紀錄〉，2020 年 7 月，未刊行。

<sup>64</sup> 梁廷毓，〈彭先生訪談紀錄〉，2020 年 8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先生代替。

桃園的龍潭...銅鑼圈那邊，還有野生動物園...六福村，以前那也是我們的土地，那是確實的，龍潭那邊是原住民的土地，銅鑼圈到六福村以前都是我們原住民的，是我們馬武督的，應該是屬於我們馬武督社，其實我們的土地也有到高遠、石門水庫下游那邊，那是我們的土地。<sup>65</sup>

高姓耆老現年 73 歲，講述銅鑼圈曾是馬武督的獵場，這或許能進一步推論彭姓耆老所述的內容，在族群遷徙之初，曾經與銅鑼圈一帶開發的霄裡社族人有所互動。接著在泰雅研究者徐榮春的田野訪談中，也採錄到一則部落耆老對客家人與平埔族之間有所辨認的記述：

關西富光國中進來、十六張那裡有一棟黃色的民宅，是清末時期鹹菜甕墾戶衛壽宗的後代住的地方。那裡最早是我們泰雅人的活動範圍。後來，客家人從關西那一帶過來開墾，我們的活動空間就愈來愈往山裡面。<sup>66</sup>

在部落耆老的口述中，對竹塹社衛家與後來客家人持續往山區開發的歷史有所區分，也指出今日衛家落戶的地點，原來是部落族人的活動領域。而在衛姓耆老的口述中，也對和泰雅族互動的歷史有所認知：

衛阿貴就是我們的祖先，那不知道多久以前，我聽長輩講的，他開墾到與泰雅族交界的地方，山裡面有泰雅族，以前都有紋面的習俗，衛阿貴開墾到交界的地方，兩族的交界，我的長輩有說，

---

<sup>65</sup> 梁廷毓，〈高女士訪談紀錄〉，2020年8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高女士代替。

<sup>66</sup>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頁 39

以前是人會殺人、原住民也殺原住民，原住民彼此相殺，因為以前沒有政府管理，後來清朝的時候就不敢這樣了，有法律就不會了，我們是熟番，不是生番，現在沒有這樣的分了，以前在交界防守，他們不敢出來，我們也不敢進去，衛阿貴的權職很高，是派人去作隘勇的。<sup>67</sup>

衛姓耆老現年 76 歲，口述祖先衛阿貴開墾設隘，一直開發到與泰雅族的交界處，也強調「在交界防守，他們不敢出來，我們也不敢進去」的敵對狀態。而在客家耆老的訪談方面，筆者在關西東山里採錄到一則黃先生 A 的口述：

衛阿貴，我們關西太和宮祈福的時候，以前就是一個他們的頭目，我們大廟就稱他為王公，他已經過世了，王爺，喊他王爺，祈福圓福就會去請他，開庄王爺就是以前早期的頭目，早期平埔族的頭目，以前庄頭的...平埔族庄頭的頭目就是衛阿貴，現在我們關西太和宮廟裡面稱他王爺，衛家王爺。從關西這裡看過去馬武督那面山排，彩和山那一整排是界山，就他們家在防守的，因為以前番仔會出草。<sup>68</sup>

黃先生 A 現年 74 歲，居於關西東山里。描述到衛家在彩和山與馬武督的交界處，進行防守泰雅族的工作。另一名黃先生 B 也口述泰雅族、平埔族之間的區辨：

關西姓衛的大部分是平埔番，以前的平埔仔，姓衛的人全部是平

---

<sup>67</sup> 梁廷毓，〈衛女士訪談紀錄〉，2019 年 5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衛女士代替。

<sup>68</sup> 梁廷毓，〈黃先生 A 訪談紀錄〉，2019 年 5 月，未刊行。訪談地點：關西東光里黃屋，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黃先生 A 代替。

埔番、平埔仔，他後來給我們同化了，現在和客家人一樣，他們全部都講客家話，他們沒有番仔話，現在泰雅族才是「真番」，我們關西這裡的泰雅族才是原住民，平埔番現在已經給我們同化了平埔番給我們客家人同化了平埔番他們現在都說客家話，這是事實，他們會說客家話，他們的祖先是番仔，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也分辨不出平埔族是不是原住民了。<sup>69</sup>

黃先生 B 現年 70 歲，現居關西東光里的黃屋。他描述「泰雅族才是真番，平埔番現在已經被同化，會說客家話」。接著是霄裡社後代蕭先生的訪談，也對泰雅族的互動有所記述：

蕭瑞雲，是頭目，是我的曾祖父，這個村莊里地位最高的就是頭目，我們是平埔族，很早就遷移到這裡生活，到清朝政府就是施行「以番制番」政策，我們是熟番，另一邊生番就趕到山上，這裡大家都在流傳我們家族是吃生豬肉的，就是祭祀祖先要一塊生豬肉和一隻刀子，後來我這一代就改成祭祀煮熟的雞、鴨、豬肉，然後一般客家人的供桌上，是祖先放旁邊，神明放中間，我們是祖先放正中間，以祖先為大。<sup>70</sup>

蕭先生住在龍潭的銅鑼圈十股寮，現年 54 歲，他口述祖先與「被趕到山上」的泰雅族不同，以及家族和客家人之間的區分。另一名同為霄裡社後代的蕭女士亦相關傳述：

---

<sup>69</sup> 梁廷毓，〈黃先生 B 訪談紀錄〉，2019 年 5 月，未刊行。訪談地點：關西東光里黃屋，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黃先生 B 代替。

<sup>70</sup> 梁廷毓，〈蕭先生訪談紀錄〉，2019 年 5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蕭先生代替。

以前客家人來到台灣無依無靠，他們要生存，就是由我們家族帶領客家人，我們祖先會帶兵，帶這些兵都是客家人，不是我們自己的族人，然後泰雅族會來出草，他們有家人被殺死的就說有這回事，泰雅族會來.....一定是互看不順眼，就是打打殺殺...搶我們的農作物，所以我們就要保護這些客家人，要養一些士兵，給客家人土地耕作，收取地租，也要負責保護水源，保護客家人的安全。<sup>71</sup>

蕭女士現居於龍潭高坪，現年 72 歲，她描述「泰雅族會來出草.....我們就要保護這些客家人」的這種互動關係，並強調在開墾工作上「帶領客家人」的角色。而在客家耆老對於平埔、泰雅族群互動的記述方面，在銅鑼圈的蕭昌衡耆老訪談中，她傳述一則馬武督的頭目曾率眾到此出草，被現在銅鑼圈三元宮的隘勇所擊斃，而頭目被殺後，眾番隨即撤退的事情：

他們的祖先蕭東盛是從霄里遷移過來的，是以前這裡的原住民...，蕭東盛是平埔族原住民，和泰雅族不同族群，一邊是平埔番，一邊是泰雅族，兩邊是不同族的，以前他們擁有的土地很廣，他們來開墾的時候，這裡的客家人還很少，蕭東盛來到銅鑼圈的時候，因為他人很高大、很威武，我們客家人就跟隨他。蕭家有養一些客家人的士兵，是有派兵保護他們(蕭家)的土地，所以現在他們農曆七月要祭祀那些陣亡的士兵，他們的說法是祭祀「有恩之人」，「有恩之人」，那些都是和泰雅族打戰犧牲的人，士兵要保護蕭姓家族的土地，就犧牲了生命，所以要祭祀這些「有恩之人」。那是馬武督...馬武督那是...泰雅族，聽

---

<sup>71</sup> 梁廷毓，〈蕭女士訪談紀錄〉，2019年5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蕭女士代替。

說以前這裡，馬武督的原住民會出草……要殺人，又沒殺到，又在廟前面被槍打死，他打死他，他也打死他，是在…廟前面，廟門是開的，那個頭目有火銃，隘勇就在那等著，就衝出來，他開槍，他也開槍，在廟前面互相開槍，是在那…三元宮，三元宮那裡，頭目被打死，他不是自己來出草，頭目被打死的時  
候，那一團人就退了。<sup>72</sup>

銅鑼圈的蕭昌衡耆老現年高齡 93 歲，現居銅鑼圈大庄。從他所提供的族譜上確認是客家蕭姓，並非霄裡社族人所傳下的世系。他描述霄裡社的「蕭東盛是平埔族原住民，和泰雅族不同族群，一邊是平埔番，一邊是泰雅族，兩邊是不同族的」，並提到霄裡社蕭家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筆者在桃園龍潭、新竹關西之交的大竹坑，也訪問到居民劉女士的「番仔相對」之口述：

以前…馬武督那邊比較多原住民，這邊比較少，但以前他們會過來會來出草，要殺人出草。後來聽說泰雅族的人被殺掉，在那個山頂上頭被剝掉，頭顱被剝掉，我們說那座山的名字叫做「番頭嶼」，「番頭嶼」就是原住民被人殺掉，大家就說那座山叫「番頭嶼」，說是番仔相對、番仔殺番仔，就叫做「番頭嶼，就說有番仔被殺掉，番仔相殺，殺到番仔拿到那山頂上。<sup>73</sup>

劉女士現年 82 歲，現居關西東山里的大竹坑，她提到十寮山在當地居民稱為「番頭嶼」，傳聞有是「番仔相對、番仔殺番仔」，一方被殺害之後，另一方將頭顱被割下立於山頂，留下「番頭嶼」之名。而相似的描述，是龍潭上林里的周姓耆老曾口述一則「番仔相殺」的傳聞：

---

<sup>72</sup> 梁廷毓，〈蕭昌衡訪談紀錄〉，2019 年 4 月，未刊行。

<sup>73</sup> 梁廷毓，〈劉女士訪談紀錄〉，2019 年 4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劉女士代替。

我祖父說粗坑一帶叫殺人窩，那是番仔殺番仔，殺到山谷裡繼續殺，雙方打很久，這種事沒人知道了，而且不是打一兩年而已，打非常久，打一打又叫人來，一直打，地名就叫殺人窩，作隘勇的就在那裡防守，番仔相殺就在那個地方，是以前原住民彼此相殺的地方，兩族的交界，隘勇在那裡防守的地方，那裡...，山上有叫做大竹坑、小竹坑的地名。<sup>74</sup>

周姓耆老現年 76 歲，現居龍潭銅鑼圈大庄。在描述粗坑、小竹坑、大竹坑一帶昔日是「兩族交界」，曾發生「番仔殺番仔」的事情。筆者在關西東山里的八寮訪問到蔡光隆先生也有相似的傳述：

從大溪的頭寮算過來，現在的石們水庫的雲霄飯店那裡是以以前的二寮，關西佛陀世界是以以前的三寮，那裡不是我祖先開發的，三寮在那裡，三寮是因為要開發大竹坑和小竹坑，大竹坑和小竹坑不是我們祖先(客家人)開發的，是現在住在十股寮姓蕭的，是龍潭高坪的蕭姓平埔族他們開發的，小竹坑、大竹坑都是他們在開發的。<sup>75</sup>

蔡光隆先生現年 81 歲，現居於關西東山里的八寮。為當時金廣成四大墾號蔡華亮的曾孫，他口述小竹坑、大竹坑為龍潭高坪的「蕭姓平埔族」所開發。與前述耆老口述「番仔相殺」、「兩族交界」的內容有所對話。另一方面，從地方沿革可以看到一些和耆老口述相關的線索，例如，龍潭三角林的開庄福德祠沿革寫到：「清道光年間，當時附近太平山、小竹坑、粗坑一帶，尚有土著、生番居住」，

---

<sup>74</sup> 梁廷毓，〈周先生訪談紀錄〉，2018 年 6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周先生代替。

<sup>75</sup> 梁廷毓，〈蔡光隆先生訪談紀錄〉，2019 年 3 月，未刊行。

<sup>76</sup>在地方人士所撰之《高原社區拓展史》亦寫到：「本區原屬人數較少的泰雅族人居住和狩獵維生的場所，迫於無奈被逼入山區」。<sup>77</sup>在地方耆老的記憶與沿革紀錄中，本區早期為泰雅族的生活空間，也是平埔族群與客家人進墾過程中面對道的族群，除了原、漢族群衝突之外，也會產生原、原族群之間的衝突經驗。現居龍潭三坑里的劉姓耆老，也曾聽聞「番仔相殺」的傳說：

三坑大伯公祠後面，老人家講是「殺人崎」，因為後面就是番仔寮，離這裡很近。我知道番仔寮那邊，說時常有番仔相殺啦，也沒有甚麼，又沒有兵，也沒有槍，是說有番仔，有聽說把還活生生的人「生理」，直直的埋下去土裡，喊做「生番立葬」，以前的人真的很壞。<sup>78</sup>

根據現年 88 歲劉先生的記憶，其家族兩百多年前就在三坑從事大漢溪河岸的貿易工作，提及在大溪番仔寮一帶有「番仔相殺」之事，並描述聽聞的內容。而龍潭上林里也採錄到一則李姓耆老的相似傳述：

以前九座寮有我們的隘寮在防守，九座寮與番仔寮隔著一條界，過去就是番仔住的地方，那裡時常有番仔相殺。因為在過去就是大溪、角板山那邊，高山族和平埔番都一樣，會殺來殺去。平埔番現在已經給我們同化了，給我們客家人同化了，他們現在都說客家話，不會說番仔話，這是事實，他們會說客家話，他們的祖先是原住民，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也分辨不出平埔族是不是原住民了。<sup>79</sup>

---

<sup>76</sup> 不著撰人，《三角林開庄福德祠廟誌》，（桃園：三角林開庄福德祠廟）。

<sup>77</sup> 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展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頁 103。

<sup>78</sup> 梁廷毓，〈劉先生訪談紀錄〉，2017 年 4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劉先生代替。

<sup>79</sup> 梁廷毓，〈李先生訪談紀錄〉，2019 年 10 月，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李先生代替。

李姓耆老現年 81 歲，出生於龍潭的九座寮，現居龍潭上林里。他描述九座寮與大溪的番仔寮相鄰，九座寮一帶昔日設有客家人的隘寮，而番仔寮那邊曾有「番仔相殺」的事情。總體而言，可以發現在各族耆老的口述中，有著各自的歷史認知，以及敘述族群互動記憶的方式。接下來，筆者將從客家、平埔、泰雅耆老之間口述，進行族群互動記憶的反思與探討。

## 五、族群互動記憶的形塑與反思

筆者曾撰文指出，在當代客家耆老對於「番害」的記憶中，並沒有明顯的「漢人侵逼說」。反而因為自己親人的傷亡而主觀上認定自己是受害者，而泰雅族原住民則被想像與重新建構成為加害者。<sup>80</sup>相反的，在當代泰雅部落在「出草」漢人的記憶中，也沒有族人被欺壓的「弱勢說」，反而將自我放在「殺人」的加害者位置，而漢人則是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受害者。<sup>81</sup>但是放入平埔族與泰雅族耆老的口述加以考察，會發現族群之間對於彼此的描述方式與記憶形塑的樣態，又更為複雜且多樣。這些複雜的記述與對於歷史的表述，值得進一步探究。

首先，客家耆老面對開墾歷史的記憶，在敘述平埔族群時，仍保留對於「番仔」、「平埔番」、「平埔仔」的群我區辨。進一步的說，在當地的客家耆老的口述中，並沒有主流歷史論述中將 18 世紀以來的番漢互動，視為「漢人欺壓熟番」的過程。雖然會區辨出原漢族群差異，但還是會將平埔族人放在地方開發史當中的重要角色位置看待。值得注意的是，所述說的不僅是漢番之間的互動，也有記述平埔族與泰雅族之間的「番仔相殺」。一方面，從第三者的旁觀角度，敘述開

---

<sup>80</sup>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 2 卷，（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20），頁 181。

<sup>81</sup> 梁廷毓，〈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第六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私立新生醫專，2020），頁 115。

墾過程中面對到兩個原住民族群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會以「殺人」、「來出草」認為泰雅族是侵犯者，而認為平埔族是被我族所同化者。

在平埔族的耆老這裡，並沒有從漢人的角度敘述內山地區的開墾歷史，而是強調家族在開發歷史中的重要位置，而在敘述與泰雅族互動與衝突的記憶時，隱含著一種文明進步論的思維，會將「熟番」與「生番」進行當代的解釋與位階的區分，暗示我族（平埔族群）是比泰雅族還文明的族類，認為「生番」是「生生的」判斷，進而區辨出「較文明／非文明」的認知，明顯地受到殖民知識與清帝國族群政策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並沒有將泰雅族的「出草」視為是侵犯者。而對於客家人的描述，則強調自己作為帶領者與保護客家人的角色，帶領客家人但內山地區開墾、保護漢佃免於遭受泰雅族的攻擊。這種「高位視角」強化了自己與漢人之間在開墾工作上的位階關係。

泰雅耆老也能傳述昔日與平埔族群之間的關係，並強調某些衝突的對象「不是漢人」而是平埔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是衝突的對象，但並沒有將平埔族群等同於侵犯者，侵犯者是漢人。雖然清代被視為「生番」的泰雅族原住民，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化外之民」，無法分享到熟番與漢人土地開墾過程的利益。因此，若從泰雅族原住民的角度理解，這些土地開墾與分配的過程，都是清帝國與隸屬於其下的墾民（漢人與平埔族），單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未經協調、任意開墾、分配土地的暴力侵佔過程。<sup>82</sup>但是在當代泰雅耆老對於平埔族的記述中，沒有強勢侵逼說，並沒有「平埔族一直進入山區」此種侵逼意味的用詞。也會區別出漢人與平埔族的不同。可以發現，在原、原族群互動記憶方面，平埔族耆老對於泰雅族的描述，隱含一種「文明進步論」，區別出「生番」與「熟番」的不同。而泰雅耆老並未將平埔族視為侵略者，並能和漢人有所區別。呈現出差異於「漢、番

---

<sup>82</sup>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台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4期，（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128。

合作對抗泰雅族」的歷史敘事。

其中，客家耆老對於「番仔相殺」的記憶，能進一步思考的是，目前多數文獻都將平埔族與客家人在內山地區開墾時關係，視為合作夥伴關係。例如，在竹塹社方面，乾隆中後期，逐漸活躍於東進拓墾行動中，並與漢人聯手合作逐步向中上游河谷拓展，繼至新埔、關西。<sup>83</sup>乾隆 58 年（1793），泉州閩南人陳智仁奉憲示諭組墾號「連際盛」，與衛阿貴合作在咸菜礮設隘防。<sup>84</sup> 乾隆 59 年（1794）陳智仁因不堪原住民騷擾，因而棄地他去放棄墾權；衛阿貴繼承墾務，續與粵佃合作開拓未墾埔地。<sup>85</sup>東進鳳山溪流域中上游的拓墾行動中少了嗜貪欺番的漢通事，各社熟番有了喘息機會，並多與客家族群合作。<sup>86</sup>在關西地區，當地漢人和熟番族群合作開墾，關係融洽。<sup>87</sup>

在霄裡社方面，為了解決缺水的問題，霄裡社頻頻與漢人合作，在水利開發上相當突出。<sup>88</sup>雍正年以前龍潭還是一片林木蔽天，遍地荊棘的景象，其開發得利於各地移民相率移入共同合作，包括平埔族（如霄裡社族人知母六等）提供土地，負責隘務屯防、粵籍（如黃明漢、黃慶興）廣招佃戶負責水利拓墾。<sup>89</sup> 清嘉慶元年（1796）知母六的後裔蕭東盛又與墾戶黃慶興繼續和墾民合力利用龍潭陂水源，興建完成龍潭埤圳，<sup>90</sup>清道光 3 年（1823）霄裡社第三代的蕭寶盛與墾

---

<sup>83</sup>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第十二屆教學碩士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3），頁 30。

<sup>84</sup>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頁 28。

<sup>85</sup> 王藝臻，〈清代新竹關西王廷昌家族的拓墾與發展〉，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論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3），頁 43。

<sup>86</sup>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頁 38。

<sup>87</sup> 范明煥，〈臺灣客家三官大帝信仰文化〉，《新竹地區的人與地》，（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6），頁 174-195。

<sup>88</sup> 陳其澎，〈八德市霄裡地區客家文化景觀之保存與再現〉，（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頁 9。

<sup>89</sup> 傅寶玉，〈水利與地方社會：大崙崁溪左岸的水圳·信仰與社群關係研究成果報告〉，（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頁 9。

<sup>90</sup> 傅寶玉，〈水利與地方社會：大崙崁溪左岸的水圳·信仰與社群關係研究成果報告〉，頁 7

戶黃明漢等人，率武裝佃民進到番界合力設置大坪隘。<sup>91</sup>1859年之後，姜殿邦與林本源家族等組成了「金泰安」墾號，開始大舉的向湳湖一帶拓墾，並且與其他地區的墾戶蕭鳴皋等人合作，建立起沿山地區的隘防。<sup>92</sup>呈現出一系列「合作開墾」的關係。

筆者認為前人在研究中使用「合作」這個詞時，可能隱含一些尚未被仔細思考的問題。黃卓權曾也曾撰文指出，施添福認為「客籍墾民之所以能夠立足於保留區與隘墾區……實得力於跟熟番保持良好的族群關係，而能獲得他們的接納和協助」這個說法，放在清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與熟番關係中來探討，對於長期處於弱勢中的熟番而言，或許未盡公平。<sup>93</sup>換言之，沒有流血衝突、合力推進墾地、共同參與開發的這種「合作」關係底下，更多的是為時勢所迫的不平等「合作」，甚至將合作夥伴與泰雅族之間的衝突視為「番仔相殺」。

一方面，清帝國的族群分類政策，區分出「熟番」與「生番」。在古文書與地契等文獻上，大多以「熟番」、「社番」、「番丁」、「屯丁」來稱呼平埔族人，以「生番」、「土番」、「番人」來稱呼泰雅族人，勢必影響著漢人對於兩者的認知。但是，在客家耆老的傳述中，仍將平埔族人在內山地區設隘防番時發生的衝突稱為「番仔相殺」。另一方面，客家耆老的表述中，若是從地方社會對於歷史的認知的記憶形塑過程，可以重新評估這項名為「合作」的過程，是否曾經處在這種具有「客家人／兩種番仔」的族群區辨、辨認的意識？無論泰雅族或平埔族，客家人在語言調性的使用上，並沒有在泰雅族／平埔族之間明顯區別出不同程度的偏見，皆以「番仔」稱之，甚至也在不免帶有歧視眼光的基礎上，與平埔族群進行「合作」？

---

<sup>91</sup> 龍潭鄉誌編輯委員會，《龍潭鄉誌》上卷，頁 51。

<sup>92</sup> 陳志豪，《機會之莊：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55。

<sup>93</sup> 黃卓權，〈清代桃竹苗地區內山開發史的族群關係〉，《客家先賢淡水同知李慎彝與內山開發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局，2003)，頁 165。

筆者能夠理解，透過當代的訪談資料，似乎很難回推清代、甚至是日治時期的族群互動關係，只能視為後裔所型塑出的當代記憶。但是，筆者試圖要指出的是「合作」一詞背後的平等與否之關係，應該有待後續研究與歷史書寫工作，審慎評估這個用詞，在描述昔時族群關係當中的合宜性。目前可知的是，至少在當代族裔的記憶與認知中，無論是泰雅族或是平埔族，兩者在開墾與守隘過程中發生衝突時，泰雅族／平埔族這「兩種番仔」與客家人的關係就立即被辨視與區隔出來。

進一步的，若回顧客家語「番仔」的語意，為舊時對原住民的蔑稱。<sup>94</sup> 例如：早期稱原住民為「番仔」也就是「未受教化的野蠻人」。<sup>95</sup>認為「番仔」是負面的詞彙，把原住民視為低劣的族群。<sup>96</sup>是帶有鄙視眼光的稱呼。所以研究者在使用時，大多會謹慎地在文章中註明「僅為清楚呈現史料語彙中之原貌，並無任何歧視或貶低之意」、「番為清代對原住民慣用的文字，為配合歷史與行文之便，予以沿用，並無歧視之意」。因此，「番仔相殺」即是隱含著將平埔族與泰雅族視為同類，與「原漢衝突」的認知有所不同。

在此，「番仔相殺」所帶出來的問題，是客家人在合作的過程中，仍然對平埔族人格上「番仔」這一歧視他者的語詞。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

---

<sup>94</sup> 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2008/05/01，引用網址：

<https://hakkadict.moe.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eeaFg/record?r1=2&h1=0&recordlinkid=HK0000002788> (讀取日期：2020年12月09號讀取)。

<sup>95</sup> 曾華源·李仰慈，〈族群和諧與社會發展〉，《社區發展季刊》第130期，(臺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0)，頁19。

<sup>96</sup> 王佑美，〈原住民日常生活歧視感受量表之編製與初步應用〉，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2014)，頁1。

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sup>97</sup>換言之，在平埔族人逐漸融入內山地區移墾社會的過程中，持續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力量在默默的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蕭家與衛家耆老的表述中，族人與客家人是在一個上與下的位階關係中進行「合作」，這種「合作」也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並區辨出，「族人在帶領與保護／客家人被帶領與被保護」的位置。如同施添福所述，隘墾區正處於漢民與熟番攜手合作，而與生番激烈爭地的拓墾前線。居民必須時時面對另一項更為嚴重的危機，即生番出草和死亡的威脅。<sup>98</sup>筆者能理解，在面對泰雅族時，漢人與平埔族之間是一種相對的合作關係，雙方是以開墾的利益為前提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但也無法忽視內部仍然存在的「微歧視」與「高位視角」之關係。因此，在一方帶有歧視、一方視己為優位的這種關係下，可以發現當代地方社會的原漢族群認知中，並不存在一種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原漢合作」關係。

## 六、結語

本文從歷史文獻與圖像中，簡述清代的「熟番」與「生番」之間的關係，接著聚焦在清代霄裡社、竹塹社的拓墾事業，梳理當時泰雅族、平埔族與客家族群的關係。再藉由筆者於 2017 到 2020 年之間，在桃園、新竹沿山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所採錄到各族群後裔耆老的口述與記憶，佐以相關的地方志，探究原、原族群互動的記憶在當代的泰雅、平埔與客家族群之間是如何被形塑與表述。

首先，在平埔對於客家／泰雅族群的互動記憶中，一方面，平埔族裔對於泰

---

<sup>97</sup> 藍佩嘉，〈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巷仔口社會學》，2013/08/26，引用網址：<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3/08/26/lanpeichia/>（讀取日期：2020年12月09號讀取）。

<sup>98</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頁 106。

雅族的描述，也隱含一種「文明進步論」，區別出「生番」與「熟番」的不同。另一方面，對於拓墾歷史的描述，則強調自己作為帶領者與保護客家人的角色，帶領客家人但內山地區開墾、保護漢佃免於遭受泰雅族的攻擊。這種「高位視角」強化了自己與漢人之間在開墾工作上的位階關係。無法忽視內部仍然存在的「微歧視」與「高位視角」之關係。因此，在一方帶有歧視、一方視己為優位的這種關係下，可以發現當代地方社會的原漢族群認知中，並不存在一種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原漢合作」關係。

接著，在泰雅對於客家／平埔族群的記憶認知方面，泰雅耆老並未將平埔族視為侵略者，並能和漢人作為侵略者的角色有所區別。呈現出差異於「漢、番合作對抗泰雅族」的歷史敘事。而在客家對於平埔／泰雅族群的記憶方面，筆者聚焦在客家耆老所述的「番仔相殺」的描述，具有「客家人／兩種番仔」的族群區辨、辨認的意識，無論泰雅族或平埔族，客家耆老在語言的使用上，皆以「番仔」來等同視之。甚至也在不免帶有歧視眼光的基礎上，與平埔族群進行「合作」。與「原漢衝突」的認知有所不同，將平埔族與泰雅族視為同類「相殺」的說法，顯示在平埔族人逐漸融入內山地區移墾社會的過程中，仍有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力量在默默的運作。